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Research Academy of Economic & Social Development

# 东北财经大学

## 发展研究参考

2005 年第 16 期(总第 39 期)

2005 年 11 月 17 日

### 郭连成 米 军：中俄转轨时期金融制度安排 及其效应分析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征途中,中国和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东欧国家分别选择了不同的转轨方式,与此相应的是,两国以不同的方式启动了各自在金融领域中的改革。而“殊途”的背后是由各自的转轨途径所引发的不同的制度效应。本文从多个层面对转轨时期中俄两国金融体制转换以及各自对金融业稳定、经济增长产生的不同效应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比较研究,并由此提出了今后转轨国家金融体制转换的制度安排取向。

### 安福仁：中国农业产业化的途径探讨

在我国,作为战略产业的农业一直以来发展滞后。生产方式的落后使得传统农业仍采取资源消耗型生产模式,严重影响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出效率。本文认为实现农业振兴、农业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农业产业化,技术进步将是农业产业化的重要支撑力量,政府的政策支持是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保证。

# 发展研究参考

2005 年第 16 期(总第 39 期)

2005 年 11 月 15 日发稿

主编：吕 炜

执行副主编：肖兴志      本期责任编辑：高媛媛 梁晓娟

主办：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地址：大连市 东北财经大学 劝学楼

邮编：116025

电话：0411-84713161      传真：0411-84713165

**E-mail**：DRR@dufe.edu.cn

**http**：[//academy.dufe.edu.cn/](http://academy.dufe.edu.cn/)

# 中俄转轨时期金融制度安排及其效应分析

郭连成 米 军

众所周知，转轨的路径安排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渐进的，一种是激进的。目前，国内学者一般将前者理解为对原有制度的边际性调整，通过有步骤、分阶段的制度安排，逐步实现制度创新的过程。这种方式初始改革成本较小，能带来稳定的制度环境，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新旧体制磨擦成本增大，改革的制度创新一定程度上显得滞后。而后者，是快速和大规模的对原有制度的整体性置换，对原有的制度基本持一种彻底否定的态度。这种方式如果割断与原有经济、政治、法律体的联系，初始成本较大，制度创新大大超出国情的适应力，因而常带来混乱。从转轨国家制度变迁的实践看，往往是将两种转轨方式综合使用。一种是总体路径选择呈现为渐进式的发展轨迹，但在局部环节或者某一阶段则采取激进的路径安排，如中国；另一种是前一阶段总体路径选择为激进安排，但在局部环节采取渐进方式，在下一阶段整个经济体转为有步骤、分阶段的渐进式路径安排，也在局部环节再次启动激进的制度安排，如俄罗斯。中国和俄罗斯在金融领域也相应采取了渐进与激进的方式启动改革。尽管改革的路径选择有较大差异，但中俄两国金融改革具有共性，即总体上都是在政府参与、推动下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不同的是，中国金融体制框架的基本形成是在没有触动原有利益格局的情况下，经过多年有步骤、分阶段的试点及相应的改革才得以确立的；而俄罗斯在改革之初就对金融体制实施大规模、快速的整体转换，直接触动了原有的利益格局，通过金融自由化在很短时间内搭建起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制度的框架。显然，在这种不同转轨路径下的制度安排下，其金融体制转换的效应是不同的。

---

作者简介：郭连成（1953-），男，吉林华甸人，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转轨经济。米军（1972-），男，内蒙古包头人，博士研究生，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 一、 转轨国家金融体制转换及其绩效与问题

俄罗斯的金融改革在较短时间内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迅速建立起适应市场化需要的新的金融体制。以银行为例，俄罗斯已基本建立了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所有制主体多元化并共同发展的银行体系，不仅有俄罗斯独资银行（包括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私人独资商业银行、国有和私有相互参股的混合银行）、外国独资银行金融机构，而且由外资参股的合资银行也相继发展起来。短短几年的时间，不仅新的银行金融机构的框架得以确立，而且，也建立了股份制、商业化、企业化、市场化的银行经营机制。有资料显示，自1998年8月金融危机后的四年间，由于银行体制改革和银行重组的深入，俄罗斯银行系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发展趋势。这主要反映在一系列指标的增长上，例如，2000年1月1日至2001年1月1日，银行系统的总资产增加了31.8%，资本增加了41.7%，而且90%的银行都出现了资本的增加。1999年1月至2002年12月，俄罗斯银行系统的总资产从503亿美元增至1260亿美元。2002年，俄罗斯银行的资本达到179亿美元，比1999年年初增加近140亿美元。尤其是经过几年的银行重组，不仅实现了银行的重新整合，撤销了250多个“问题银行”的经营许可证，而且加强了金融资本的相对集中。基于银行系统的这些变化，俄罗斯权威人士普遍认为，俄罗斯银行系统总体上已经克服了金融危机造成的后果，其状况目前相对稳定。银行总资产和对实体部门的贷款与GDP之比已提高到危机前的水平，居民对银行的信任度正在恢复并逐步提高。所有这些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银行职能和作用在经济中的发挥。

中国的金融改革所形成的新旧两种体制长期并存的局面，一方面导致旧体制的弊端无法迅速根除，另一方面新体制的优势也难以充分发挥，致使金融业的改革明显滞后。目前，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多元化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体制。既有国有独资的四大商业银行，也有由国有控股或国有法人单位共

---

郭连成著：《俄罗斯经济转轨与转轨时期经济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38-339页。

同组建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有多家国有性质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几家完全民营或民营控股性质的金融机构和少量的外资金融企业。但是，大量存在的仍是以国有控股为主体的金融机构，而其中大部分又属公有制性质。国家仍然在银行领域占据主导地位，银行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多的行政关系。“因此，央行与商业银行的关系仍是一家人的亲缘关系，虽然各自都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只是机制不同而已，而产权都是同一的。这种产权的同一性很难脱离‘父爱主义’，难免出现‘利益平衡’的倾向。”这使得银行商业化、市场化的金融创新运行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严格地说，目前中国的银行体制仍处在向真正的商业银行转制的过程之中。事实上，在保持国有独资的情况下，建立真正商业化的运行机制的可能性很小（中国的银行和金融市场运行效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2003年底450亿美元的股份制试点，就是一次通过引入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打破国有独资单一产权结构的尝试，其成效如何，是“输血”还是“造血”，完全取决于下一步“内部重组”的成功与否。

## 二、 转轨国家金融制度安排与金融业的运行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心。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一国金融的发展与稳定对该国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 1. 金融改革与中国金融业的稳定运行

中国通过20多年的金融改革，成功地实现了对金融的控制，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为中国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的这种改革得到了欧洲复兴银行和世界银行以及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的肯定，认为这种选择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和历史发展。国内著名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的金融结构仍然是一种政府直接控制和国有（商业）

---

赵传君著：《中俄经济体制改革比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8页。

银行垄断的体制”。这种双轨运行的金融体制却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我国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处于稳定安全的运行状态。因为这种渐进式的金融改革与开放政策，能够有效地控制国内金融市场化、商业化、国际化的次序和运行的步伐(特别是资本的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顺序)，从而一方面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全面开放所招致的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另一方面，政府的有效控制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有效的投融资支持并保证了强劲的经济增长。

“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问题”，没有稳定，一个大国的改革成本支付是高昂的。中国的经济转轨正是在金融业的可控运行框架下，推进具有明显市场化倾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从而实现了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换言之，中国金融改革的制度安排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增长。还应指出，多数学者认为，中国能在巨额的不良资产下，幸免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没有过早地开放资本账户。这种看法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资本项目没有开放，可以使中国避免因金融全球化联动效应所带来的冲击，但若将中国金融改革的成效，特别是将成功抵御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仅仅归功于资本项目没有开放，似有否定中国20多年金融改革制度安排的成效之嫌。笔者从金融制度安排角度出发，认为中国没有实行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本身就是中国政府主导和控制金融业，使其服务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实体经济运行的一项重大举措。因为，中国政府主导下特殊的金融制度安排很大程度上弱化了金融市场的波动性。按照一般金融理论，资本市场的波动性远远高于银行信贷市场。中国排斥或限制国内私人借方和非居民进入金融市场，实质上仅为国有借方提供筹资场所，这种安排造成资本市场发展滞后、开放程度低以及市场份额相对较小，如股票市值和债券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别是32%和17%。同时，国有金融中介又控制着庞大的金融资产，造成银行信贷市场较为发达，如中

---

张曙光：《疏通传导渠道，改善金融结构——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管理世界》2001年第2期，第17页。

主要归功于资本项目没有开放有失偏颇，因为即使开放了资本项目，中国政府外债一直在国际警戒线之内，足以对深受不良债务困扰的银行体系提供财政支持(世界银行)。但笔者以为，除此而外，还应该将着眼点放在中国独特的金融制度安排上。

国银行资产占GDP的比重为121%，提供了近80%的间接融资。另外，这种制度安排所形成的金融支持对经济增长也贡献颇多，国内经济稳定增长的态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或掩盖了对金融的不利影响（金融的脆弱性和不断增大的金融风险）。

## 2. 金融改革与俄罗斯金融业的运行

俄罗斯在经济增长停滞的情况下采取了激进的金融改革方式，过早实行了金融对外开放，国内金融改革和金融对外开放几乎同步进行，致使金融改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外部因素的支配和影响。俄罗斯激进自由化的金融改革，目的是扩大经济的对外开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为此，政府和中央银行放弃了大量金融控制权：金融机构准入大大降低设限；由于国有金融中介原有的资本结构进行强有力的重组而大大降低了政府对金融资源的控制；允许国内外投资者和国际投机资本频繁在股票和国债市场进行投机活动；允许卢布自由兑换。这种还权于市场的金融制度安排，期望构建市场化、自由化的金融运行环境，提高金融效率，为实体经济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渠道。然而，过早地打通国内外金融市场的通道，必然会受到来自发达国家金融资本的冲击和控制，甚至会带来国内金融环境的混乱，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转轨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必然要面临的考验。问题在于，俄罗斯的金融制度安排造就了一个抗风险能力弱的金融体系。虽然国内金融系统发育程度很低，但开放程度却很高，国际资本在俄罗斯金融市场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银行信贷体系较强的自主性和盲目的逐利性使之不能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为弥补国家财政赤字发展起来的证券市场虽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资金，但却切断了实体经济的资金来源，使得资金很少投向实体经济，严重弱化了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致使其国际收支恶化，外汇储备不足；自由化改革非但没有增加外汇收入，反而为国内资本的大量外逃开了通道。总之，俄罗斯的这种制度安排，不但没有为经济转轨提供稳

定的金融制度环境，反而客观上破坏了金融秩序的健康运行；不但没有通过制度安排弥补先天金融体系自组织运行不足的缺陷，改善国际收支，促进经济增长并进一步为改革提供稳定的经济基础，反而带来了经济的衰退和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由东南亚金融危机而引发的俄罗斯1998年的金融危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俄罗斯过早地开放金融市场和疏于对金融自由化的干预和控制，致使金融市场急速发展，短期资本大量进出，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性膨胀。而这种金融制度安排不仅没有带来经济的复苏，反而导致国内经济长期和大幅度的衰退，如在1992-1998年俄罗斯GDP均为负增长，仅在1997年有微弱的0.9%的增长。

### **三、 转轨国家金融制度安排与本国的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

由于本国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经济增长乏力，转轨国家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新的机制来调动金融资源以利于经济增长。而这种资源调动机制能否有效发挥作用，首先要看是否有完善的金融调节机制，还要看有否能够吸引资源的效率高的实体经济，以保证投资资源较高的期望回报率。而这两点几乎所有的转轨国家都不具备。因此，单靠市场性的制度安排很难充分动员国内储蓄资源以投资于实体经济部门。这就需要一种特殊的力量将各种资源有效动员起来，支持本国经济稳定发展。实践证明，现代经济增长、发展与企业融资、发展已完全融合为一体。有资料显示，企业融资对现代经济发展的直接和间接贡献已达到全部经济发展的 2/3 左右。很明显，要保证现代经济的顺畅运行和稳定高速发展，必须保证企业能够融资和高效融资。对转轨国家来说，银行是主要的金融中介机构。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必须提高企业的银行信贷水平。转轨国家对金融资源一定程度的有效控制恰恰是在特殊时期解决经济增长融资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 **1. 中国的金融制度安排促进了本国的经济增长**

改革以来，随着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的组建和发展，

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得到一定的削弱，但是直到目前，这些银行的金融资产仍占全部金融资产的70%，并占有全国存贷款市场的60%以上的份额。这四大商业银行依然对全国的金融资产和金融市场保持绝对控制的局面，表明了中国政府对银行的垄断格局。在这种状况下虽然潜藏着很多问题，但从积极的方面看，正是这种对金融资源的控制地位，才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工业企业资金的供应，保证了转轨经济持续呈现“J”型的增长态势。我们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企业（除外资及合资）的发展主要是依靠银行融资来推进的。即使是在世纪之交，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的60%、流动资金的90%来自银行贷款。进入新世纪以来，以银行中介为主导的金融制度安排，依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据绝对优势。截止到2001年，中国银行信贷间接融资在全社会融资总额中的比重高达91.82%，而金融债券等直接融资只占到8.18%（扣除国债和金融债券融资企业外部融资只占直接融资的2.15%）。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在资金配置方面的绩效是显著的，不容忽视的。这避免了，俄罗斯等一些转轨国家因企业缺乏资金供应而招致经济停滞、社会矛盾激化的局面。随着金融商业化改革步伐的加快，市场性融资会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渠道，国有银行的非市场性融资的比重会大大减少。但转轨经济的特殊性要求国家加强一定的金融控制，这对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保证我国的经济安全以支持转轨经济顺利进行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 2. 俄罗斯金融制度安排导致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大大减少

在银行体制转轨进程中，俄罗斯迅速建立起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商业银行体系，国家对银行业的垄断已基本被打破，大部分商业银行均属于完全按照市场化运作的不受政府控制的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尤其是外资银行在俄罗斯银行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资本占俄罗斯银行业资本的比重在金融危

---

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银行信贷间接融资占企业外部融资比重低于70%，而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的比重为20-30%。

张宗新：《转型经济中融资制度绩效的经济分析》，《财经研究》2002年第8期，第16页。

机前就已经超过1/4。而俄罗斯企业的情况是，通过证券私有化和货币私有化，国有大中型企业基本实现了私有化的改造，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实行的个案私有化又将大型企业中的国有股份公开出售。目前，俄罗斯绝大多数企业已经基本实现了完全面向市场的私有化改造，因而企业的融资需求只能通过市场渠道和自有资本的积累。除了极少数企业依靠国家商业银行为其发展提供资金外，其余企业基本失去了国家提供融资的保障。为了解决企业的融资保障问题，私人金融机构和私有化的企业相互融合组建了金融工业集团，或者是原国有企业经私有化改造后依靠其自身的资产组建了隶属企业的商业银行。这些商业银行的贷款主要是满足本集团的资金需求，但由于逾期债权的不断增加和银行参与工业企业管理的效率低下，工业企业盈利率下降甚至大大低于银行的贷款利率，导致了俄罗斯商业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减弱，银行将资金投到能够带来较高盈利的安全性高的国家有价证券市场。尤其是在俄罗斯社会经济不稳定时期，这些商业银行更加倾向于从事能带来丰厚利润的金融投机，很少愿意对企业投资，从而使本来就运作艰难的实体经济部门濒临破产的边缘。

据俄罗斯银行和发展中心提供的资料，俄罗斯商业银行对实体经济的贷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1997 年 1 月为 8%，1998 年 1 月为 9.4%，1999 年 1 月为 11%。但这类贷款多为短期贷款，且基本没有对固定资产投资，银行为非金融企业提供流动资金成为银行体系发挥作用最富有成效的方面。由于这种状况，在 1991-1998 年，俄罗斯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下降了 76%。2000 年以来，随着俄罗斯金融危机不良后果的逐步克服，俄罗斯银行部门积累和配置资金的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对实体经济投资的信贷取向更加明显。1999-2002 年银行贷款给企业的实际数额比危机前增加了 22%。但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这个支持力度仍很有限。总的来看，俄罗斯银行体系对实体经济投资大大减弱，远远低于企业对银行贷款的需求，而政府又没有足

---

庄毓敏著：《经济转轨中的金融改革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6 页。

够的资金，实体经济部门单靠市场融资渠道和自身的资金积累已远远不能满足投资需求，更何况这条融资渠道在很大程度上被堵塞，因而金融自由化非但没有保证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反而为其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稳定增加了动荡的因子。正如俄罗斯经济学家古宾所指出的，俄罗斯到了“封闭金融资源和预算资金在国民经济中的循环，堵死资本流失的渠道，扩大资金向实体经济部门流动，放弃对俄罗斯经济自发的自我健康化过分的期待。要实行这样的政策，需要有政治意志，需要集中和加强联邦的权力，其中包括提高联邦经济和财政金融主管部门的协调作用。”可见，一定程度上加强国家对财政金融资源的控制，有效发挥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机构的业务能力，如加强央行对银行的再融资，加强机构投资者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投融资发展，鼓励企业长期债券市场的发展，这些都对转型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大有裨益。

### 3. 转轨国家的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问题

通过以上对中俄经济转轨与经济增长相关问题的分析，我们发现，转轨国家的经济增长往往与银行体系的不稳定发展相伴而生。这种不稳定可能来自于实体部门和银行体系本身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对银行体系自身而言，主要是自有资金和风险资本之间的不协调发展；对于实体部门来说，则主要是作为借款人的企业收入和还款之间的不协调发展。正是转轨国家存在的这种多重不协调，导致金融机构出现了超过自身风险管理能力的信用投放，使银行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贷款。当然，其中大部分不良贷款是由于信贷的非市场化投放等历史原因造成的，也有一部分是市场化投放造成的。随着银行约束机制的不断完善，信贷市场化投放会占据主导地位，银行信贷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必然会使银行的不良贷款比重越来越小。目前，转轨国家的不良资产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其中，银行的不良贷款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98 的统计，从 1980 年以来，由于不良贷款过高而

---

[俄] 先恰戈夫主编：《经济安全——生产、财政、银行》，中国税务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4 页。

引发金融问题的国家占到所有发生金融问题国家的 66%以上，而不良贷款过高引发的金融危机占到 58%以上。因此，转轨国家对不良贷款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但不能因噎废食，因为害怕出现不良资产而拒绝给企业提供信贷，导致投资的下降和经济的萎缩。只有加强宏观调控和经济监管，强化企业化原则和公司制度，在引导银行信贷与企业投资之间形成紧密的银企良性互动关系，才能最终化解和避免不良资产。

#### 四、转轨国家金融制度变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与金融效率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史，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演进，国家对金融的控制地位要相应下降，这是金融产权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就是说，民营化成为金融所有权关系发展的方向。因为私有化或民营化可以提高银行的利润率，可大大节约政府的各种支付成本。理论和实践都证实，转轨国家国有银行的存量必须要改革，国有银行的私有化或民营化是未来银行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俄等转轨国家相继进行金融所有权关系调整的原因之一。中俄两国金融改革总的方向是对的，但绩效却不同，这是因为，中俄采取了不同的金融所有权调整战略。

在放弃原有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初期，中国在政府的主导下，在增量调整的同时依然没有放弃国家对金融的控制地位。通过国有金融控股实现国家的各项经济金融目标，以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减少金融系统风险和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弥补金融监管和调控以及金融机构自组织运行机制的不足，有效促进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可以这样说，国家的金融监管和调控同国有控股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国正是期望通过国有控股来弥补不成熟的金融监管和货币调控体系的不足。虽然中国金融机构产权形式多样化，但基本上是公有形式的变种（甚至是金融市场也成了专为国有借方制造的筹资场所）。公有制这种所有权形式本来在计

---

张杰：《转轨经济中的金融中介及其演进——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管理世界》2001年第5期。

划经济体制下就被证明是低效率的，将其应用到金融产权关系领域，在20多年的改革实践中，同样表现出了不能令人满意的一面，如国有金融机构内控管理机制较弱，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孳生出大量的不良资产，国有金融机构运营效率也相对低下。但是，由于转型时期这种制度安排弥补了金融监管的不足和有效地调控了金融资源，加上国家强有力的信誉担保，从而保证了对多年来高经济增长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国际收支账户也呈现出良好的增长态势，保证了中央稳定的财政收支，维护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这种良性循环的金融和经济发展态势，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国有金融控制的不利影响。因此，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轨经济中的这种金融制度安排，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或具有效率增进的性质。当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至20世纪90年代末，当中国经济进入“过剩经济”阶段后，这种金融制度安排越来越表现为效率低下、金融创新迟缓、市场化停滞不前、金融风险不断增大，而国家控制下的金融机构作为出资方与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关系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对代理人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考虑到中国的实际，虽然国有金融产权垄断的退让是必然趋势，但不宜过大，尤其是随着金融业开放程度的扩大和更大程度上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国仍然适宜发展以国家相对控股为主，战略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共同参与的股权结构。同时，必须加大培育金融体系的自组织机制和内控机制，探索和不断完善适合中国的现代金融监管制度，加强推进金融市场化进程。随着这些前提条件的不断成熟，可以相应减少国有金融控股地位。

在金融领域，俄罗斯的金融中介机构重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都与私有化密切相关，主要是为私有化服务的。俄罗斯通过彻底的存量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国家对金融资源的控制地位。在金融中介领域，俄罗斯最大限度地减少对金融机构所有制形式和金融业务的限制，新旧金融制度并存的局面在较短时间内基本上被革除，私人所有制和混合所有制为主导的新型金融制度在较短时间相继建立起来。国有股份在银行业已经不占有垄断地位。到1998

年金融危机前，俄罗斯银行的法定资本中国家投资部分仅为1.3%（包括国有性质的储蓄银行的资本）。而且，绝大多数的银行既没有建立起存款保险制度也失去了国家的信用担保（直到2003年底俄罗斯才实行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结果这些新型的银行普遍存在存款荒，不仅自有资本短缺，而且银行资产比重也过低。唯一由国家信誉担保的储蓄银行则在吸收存款方面处于有利而垄断的地位。据俄罗斯过渡时期经济研究所的相关资料，俄罗斯储蓄银行吸收了70%的私人存款，另有资料显示，俄罗斯居民的80%的卢布储蓄和50%的美元储蓄集中于储蓄银行。由于国家对金融资源投向和使用缺乏有力的宏观调控，导致居民、企业、金融机构将资金大量投向国债市场和股票市场，用于从事投机活动，特别是造成国债市场的扭曲性发展。由于金融市场化顺序安排失误和改革盲目激进，使俄罗斯整个经济局势愈加混乱。如为了推进利率市场化较早地放开存款利率，结果造成金融机构在利润动机驱使下盲目扩张资产规模，缺乏约束力的商业银行采取高息揽储措施，出现恶性竞争。在支付高存款利息的情况下抬高贷款利率，致使企业部门融资成本骤升，生产经营陷入困境。从长期看，这最终也会危及俄罗斯银行自身的生存，引致社会资金供需失衡，最终酿成系统风险和国家风险。

金融危机后，俄罗斯再次对金融中介机构进行重组，加强了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管，强化国家对金融的控制地位，有力地发挥国家的作用。在不违背银行资本民营化的前提下，加大国有股份在部分银行中的比重，并规定中央银行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俄罗斯最大的银行保持绝对控股地位（目前央行在储蓄银行的股本占到50%以上）。据有关资料显示，俄罗斯1998年金融危机后，非居民大大减少了对银行的注资（截止到2002年4月，外商独资银行在俄罗斯银行体系的比重下降到6%），而俄罗斯国内的私人资本也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已经没有能力对银行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银行脱困和保持银行业的稳定，俄罗斯中央银行为一些商业银行提供

---

[俄] 过渡时期经济研究所：《过渡时期经济》，1998年版，第506-508页。

了大量贷款或其他融资服务，使国有资本的股份在银行体系中的比重大幅增加，从1999年1月的不足6%增加到2002年4月的21%。由此，大大增强了俄罗斯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稳定了银行业，并对俄罗斯实体经济的复苏提供了一定的金融支持。目前，俄罗斯银行的经营状况明显好转。其一，在对实体经济贷款大幅度增加的同时，银行的利息收入明显增加，而且2000年银行利息收入首次超过银行外汇业务收入，2001年银行利息收入首次超过有价证券收入，也超过银行外汇业务收入。其二，银行体系的风险水平逐步降低，外汇储备增加，卢布汇率保持较为稳定的水平，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逐步提高，从1999年1月的11%提高到2002年的20%和2003年的19%。此外，金融危机后，俄罗斯着手建立对银行的约束机制，加强存款保险制度的构建，并在2003年年底实行了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在2004年7月爆发的银行挤兑风波中，俄罗斯经受住了考验，卢布币值未发生大的波动，维护了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然而时至今日，俄罗斯仍然没有构建出竞争充分、机构多元、工具齐全、交易规范公正和信息公开透明的货币市场，距离完全市场化还有较大差距。同时，俄罗斯市场化金融监管体系依然没有形成适合国情、有效健全的法律监管框架；金融机构的内控机制虽有了很大提高，但也很不规范，俄罗斯需要加强国家金融控制地位来弥补市场化金融监管和调控体系以及金融市场发育不成熟的缺陷。最近，俄罗斯学者在反思了私有化浪潮后也认为，政府不会也不应该完全放弃银行，如果完全放弃国有银行，政府就会失去调控金融体系的杠杆。

## 五、 结 论

第一，转轨经济的特殊性要求转轨国家必须占有相应的金融控股比重，这对于稳定金融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西方大国经济、金融体系的成功

---

范敬春著：《迈向自由化道路的俄罗斯金融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4、86页。

当然，由于俄罗斯银行资本金总体不足，低于其他一些转型经济国家，银行对实体经济的贷款相对较弱。

案例也表明，资本实力雄厚的大银行是一国金融体系稳定的基础，这类银行抵御金融风险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金融体系的稳定程度。一般说来，这些国家排在前几位的大银行往往都是银行股份为本国所有的本民族的银行。这些事实说明，转轨国家必需拥有能够左右金融大局的本民族的银行。特别是在转轨的特殊时期，培育国家控股的、能左右和影响金融大局的骨干商业银行，对转轨国家稳定金融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中国目前致力于打破国有银行占垄断地位的银行业格局，以期形成多元化投资主体并存的竞争局面。在这场金融制度的变迁和重组的过程中，国有银行必然要过渡到产权多元化的所有制形式，建立起真正的符合国际一流银行标准的商业银行运营机制。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保留几家由国家控股的本民族的大银行仍然是必要的。

第二，转轨国家的金融改革是一项长期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要依照本国的国情采取相应的金融自由化、市场化的改革顺序，不失时机地加快推进金融改革。而且，转轨国家在转轨过程中同时面临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和保持金融稳定的多重任务，如果不考虑所有这些因素，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金融制度模式，这对转轨国家显然是很不现实的，既不利于转轨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稳定，也使得转轨国家金融改革的效应大打折扣。

俄罗斯的金融改革与本国初始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传统严重割裂，而且新移植的金融制度被改革者强制推行。因此，尽管俄罗斯建立起了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多元化的金融市场格局，且自由化、市场化、股份化、商业化程度相当高，但金融创新机制不能达到普遍的报酬递增运行状态，致使金融制度变迁朝着非绩效方向发展。但也不能否认，俄罗斯金融快速市场化改革的绩效已经在局部领域显示出来：其一，为金融市场的发展创造了自由宽松的准入环境和制度环境；其二，金融机构数量增多，非国有金融成为金融市场化运作的主导，金融机构的自组织能力逐步增强；其三，银行业和证券市场较早地融入国际金融市场，并跨越了国有银行产权调整这一金融“硬核”。

这对俄罗斯原有的国有银行来说总体利大于弊，它不仅带来了新的经营机制和服务理念，更重要的是，使金融中介治理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金融机构基本上形成了较强的预算约束和市场化的运营机制；其四，俄罗斯通过了自然人存款保险法律，市场化的存款保险机制正在建立起来。

第三，在金融改革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中推进转轨国家的金融创新。虽然俄罗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导向型的高度开放的金融体系，但时至今日，俄罗斯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并未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也未出现明显的良性互动。而且，俄罗斯转轨以来实体经济持续滑坡，增长乏力，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本国银行体系的融资功能。与俄不同，中国金融改革与实体经济之间形成的良性互动已是不争的事实，但金融改革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仍然受到信贷体系融资的约束。因此，对转轨国家来说，只有在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中解决金融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并加快金融改革和及时推进金融创新，才是一种良性的改革，也才能真正建立起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支持机制。

### 参考文献：

1. [俄] 先恰戈夫：《经济安全——生产、财政、银行》，中国税务出版社 2003 版。
2. [俄] 过渡时期经济研究所：《过渡时期经济》，莫斯科 1998 年版。
3. 郭连成：《俄罗斯经济转轨与转轨时期经济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年。
4. 吴敬琏等：《渐进与激进——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5. 唐旭主编：《金融理论前沿课题》（第二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3 年版。
6. 张曙光：《疏通传导渠道，改善金融结构——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管理世界》2001 年第 2 期。
7. 庄毓敏：《经济转轨中的金融改革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8. 范敬春：《迈向自由化道路的俄罗斯金融改革》，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9. 易宪容等：《现代金融理论前沿》，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5 年版。
10. 刘明：《转型期金融运行与经济发展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 中国农业产业化的途径探讨

安福仁

## 一、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农业产业化

农业是中国的战略产业，发展农业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综合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农业是中国的最大产业，农业的发展涉及到中国十三亿人民的食物供给问题，只有农业发展了才能解决九亿多农民的致富问题，才能解决四亿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农业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其一，农业生产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接近 20%，占国民收入 30%；其二，在出口创汇中，有 40%来自农业产品的出口；其三，在中国的轻工业生产中，农业是主要的原料来源，占轻工业产值的 66%；其四，农业为中国协调国际关系提供重要的物资保障。到上个世纪末，中国的谷物、棉花、油料、肉类等主要农产品的总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其中谷物产量占世界的四分之一，肉类产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具有 13 亿人口的农业大国，虽然已告别了食物短缺的历史，但在建设全民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农业仍然是一个发展滞后的产业。中国农业的生产方式仍然是落后的，基本上属于传统的资源消耗型生产模式。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农产品市场面临来自国外高科技含量农产品的激烈竞争。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振兴农业，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是实现农业产业化。

农业产业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是在科学发挥市场功能的基础上，转变各级政府的职能，树立农业、农民和农村的整体发展的观念，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整体战略、区域战略和时期战略。2004 年 3 月 5 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

作者简介：安福仁（1953-），男，辽宁绥中人，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财政税收与产业经济。

中指出，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按着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强农业、支持农业、保护农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要重点支持主产区发展粮食生产，启动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建设稳产高产基本农田；要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农业，提高农产品质量和竞争力；推进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建设，促进产业化经营，走农业产业化道路。

农业产业化以市场为导向，它要求农业产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必须根据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求来决策，以持续保护和科学开发农业资源为前提，以提高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中心，实现种植、养殖和加工多形式的优化组合，使农业生产规模化、专业化、科学化和社会化。实现农业产业化，就是要使农民面向市场进行生产经营决策，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和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实现农业产业化，就是要加快传统产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进程，促进农业生产要素的合理组合，摆脱区域性约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农业产业化可以延长农业产业链，突出资源优势，提高经济效益；农业产业化可以实现城乡优势互补，通过以乡促城、以城带乡、城乡互补，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为建设全民小康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农业产业化有利于改变目前的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便于政府统一城乡税制，实现城乡税收公平负担，促进农业产业的发展。

农业产业化以主导产品和支柱产业为先导。发展主导产品和支柱产业是实现中国农业产业化的一个重要依托力量，是区域农业经济发展优势的体现，是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柱石。发展农业主导产品和支柱产业，就是要利用本地的资源优势 and 区域农业优势，通过专业化生产和集约化经营，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和区域特色的农业产业和产品。通过发展主导产品与支柱产业，能够尽快实现“一村一品、产一品富一村”和“一乡一业、兴一业富一乡”的农业发展区域战略。通过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主导产品与支柱产业，不仅能够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还能够带动区域其它产业

的发展。

实现中国农业的产业化，必须对土地资源进行资本化运作。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根，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资源和资本。改革开放多年来，中国农村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按照农业产业化的要求，继续将农民锁定在所承包经营的固定土地资源上，承包权和经营权统一，对土地资源的利用存在着效率限制。政府的战略选择是运用市场化的理念，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土地资本。根据中国的国情，土地资源是最大的国有存量资产，变革土地资源的经营机制，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土地资本，是政府的重要战略选择。将土地资源转变为土地资本，主要是使土地的使用权资本化，通过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实现土地资本的最大化增值。土地使用权资本化的有效途径是建立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将土地作为资源的聚合体进行资本运营，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逐步把土地资源的使用权集中到懂技术、善管理、高素质的农民和各类农业公司手中，形成多元化的土地开发投资机制，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组合，促进土地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创造农业综合开发和土地资本的最大规模效益。

## 二、中国农业发展的支撑力量——技术进步

提升中国农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支撑力量是技术进步。中国农业基本上属于传统产业，生产技术落后、产业化程度和现代化水平都较低，农业经济增长幅度缓慢。解决中国农业落后问题的重要依托是提升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

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农业经济的发展主要由三个因素引起的，一是资本的投入，二是劳动的投入，三是技术进步。这三个因素是决定农业发展的重要因子，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科学技术，它是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力。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指出：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必须要求农业科技有一个大的发展，进行一次新的农业技术革命。科学技术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对于我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说尤为重要。

用科学技术武装农业，能够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一种潜在收益。

中国的农业发展必须依靠技术进步。建立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农业科技体系，高效率的农业科研成果技术推广体系，高效益的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基地，是中国农业的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目前，中国农业发展滞后所面临的制约因素主要是：农业生产力水平低，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差，农业经营分散、产业化程度低，农业收益率低，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低。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低，导致的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业的收益率低。而导致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低的根本原因是农业的资本投入不足。在中国，解决农业技术进步和实现农业产业化，离不开市场和政府。政府的重要贡献是制定面向农业、面向农村、面向农民的农业科技发展规划。一是创新农业科技资金投入、技术研究和科技管理体制，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企业、农民和全社会参与的发展农业科技的多元投入机制，建立纵向有层次、横向有分工的农业科技研究体系和队伍多元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使农业科技管理走上法制化、科学化和制度化的轨道。二是建立发展科技农业的系统工程，坚持以农业科技基础研究为出发点，对农业生物基因图谱、基因标记与定位、克隆技术、生物光合作用、生物杂种优势机理与应用、生物固氮、高产优质的生理基础等进行基础研究，将高新技术应用于农业领域。三是用现代工业技术与产品装备农业，提高农业生产手段的技术含量。四是建立农业资源环境科技工程，在充分利用、整修国土资源和水资源的前提下，做好生态改善和环境保护工作，控制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农业生态环境污染，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五是发挥地区的资源优势，根据不同地区的土壤、气候、光照、降雨、气温等客观因素所决定的地理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科技农业项目，只有在挖掘资源优势的前提下发展科技农业项目，才会生产得天独厚的产品，才会获得经济利益上的比较优势。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没有技术支撑的农业是没有发展出路的。在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既定的前提下，依靠技术进步的支撑可以打破因人力与资

本资源的有限性而形成的人均农业产出的极限。尽管在中国的历史上实际农业经济增长过程并未出现过一个趋近于极限的征兆，但理论上这个极限是存在的。理论和实践还证明，如果技术进步能够持续地坚持下去，就可以持续地打破农业经济增长的极限。而且，技术进步越快，经济增长就越快。经济学的理论还表明，随着资本的深化，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下降，最终资本增长率与劳动增长率相等或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时，人均农业产出的增长就唯一地决定于技术进步。根据下图进行理论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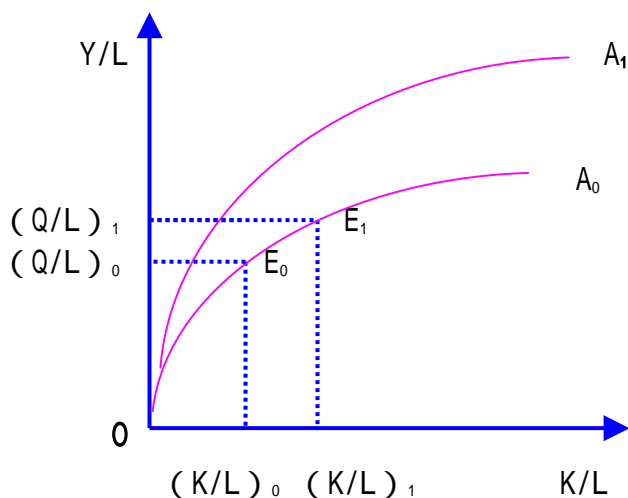


图1 技术进步对人均产出增长极限的突破

图1中，纵轴  $Y/L$  表示人均产出水平，横轴  $K/L$  表示资本与劳动之比。 $A_0$  表示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前，随着资本与劳动之比的提高人均产出的增长曲线。这条曲线表明：当资本与劳动之比由  $(K/L)_0$  提高到  $(K/L)_1$  时，人均产出由  $E_0$  增加到  $E_1$ 。但根据曲线  $A_0$  的走势，随着资本与劳动之比的提高，人均产出的增长达到一定水平之后随之下降，这说明人均产出的增长是存在极限的。这说明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资本积累成了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人均产出为什么会存在极限呢？主要是从耗竭性资源的有限性和对环境的压力来考虑的。如果一个国家不考虑经济增长可利用资源的可能性，

盲目地追求增长速度，最终会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导向阶段性高涨、长期性萎靡的困难境地。

上图表明，由于技术进步使人均农业产出增长曲线由  $A_0$  向上移动到  $A_1$  位置。在技术进步条件的  $A_1$  曲线明显高于没有技术进步条件下的  $A_0$  曲线。这说明技术进步使农业人均产出增加，并突破农业增长极限。技术进步使农业人均产出增加并突破增长极限的本质问题，是技术进步抵消了资本深化使资本收益率递减的作用。这个理论告诉我们，要加快农业的发展，就必须提升农业科技水平。

提升农业科技水平的途径，主要是通过自主研发农业科技技术和从国外引进先进的农业科技技术。由于目前我国农业生产水平低、贫穷地区农民的收入水平低、农业产业化的程度低、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差、农业的经营相对分散、发展科技农业的风险大，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导致农民对发展农业科技的私人资本投入缺少利益驱动。因此，依靠技术进步推进农业经济增长，政府必须提供财政政策支持。一是支持农业科技基础研究，二是支持农业资源环境科技研究，三是支持优势资源的利用研究。对此，政府应设立农业科技开发与利用的专项扶持资金，包括“农业科技攻关与技术研制扶持资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科技成果转化扶持资金”和“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扶持资金”。通过农业科技技术的研发、展示、应用、推广，带动农业的全面升级。

### 三、中国农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政府支持

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促进中国农业发展和实现农业产业化，政府必须提供政策支持。政府政策支持的重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支持农业水力建设，二是支持粮食生产，三是农业信贷。

#### 1. 政府支持农业水力建设

水是人类生命之源，就农业生产而言，水具有特殊的意义。农业是一个

以自然资源为前提条件的特殊的产业，土地是农业的基础，水力是农业的命脉。改善水环境，是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水对农业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然而，中国虽然是一个水资源大国，水资源的总量在世界排名第六位，但人均水资源仅有 2500 立方米，是世界 13 个缺水国之一。中国水资源的分布极不均衡，城市密集度和工农业生产水平较高的黄、淮、海地区，人均水资源还不到 500 立方米。近些年来全国仅灌区每年缺水就达 300 亿立方米，导致粮食减产达数百亿公斤。水资源的短缺制约着中国农业经济的增长，进而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而中国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特征，迫使人们必须在提高单位耕地面积产量上下工夫，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是尽可能地利用水资源发展灌溉农业。但灌溉比重越高，意味着农业对水资源的依赖程度越大，水资源的短缺问题更加突出、危机更大。同时，由于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水平低，粗放用水，导致过多地开采地下水，一方面使用水成本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形成地下漏斗，使地下水位下降，导致沿海地区海水倒灌，使大面积的耕地变成盐荒地。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水虽然也是一种商品，但由于水资源是人类生存、工农业生产、生态系统不可缺少的又不可替代的重要商品，因此对水资源的供应与需求不能完全依靠市场价格来引导，政府必须实施宏观政策调控。一是政府应通过财力支持和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与个人积极地投资于水资源的有效开发，包括科学地利用河川径流水、合理开采地下水、有效积蓄天然水、积极开发海洋水、增建和兴建跨流域蓄水、调水工程和采取涵养水源措施等多途径的水资源供给体系。二是政府通过法律或行政命令的形式对水资源的供给、开发、使用、调配实行政府管制。三是政府要积极防治与控制水资源的污染，重点保护地表水不受污染。四是政府在政策上鼓励发展节水高效型农业，并通过国债投资重点加强农田水利建设。

## **2. 政府补贴粮食生产**

政府抓住农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重点支持主产区发展粮食生产，

启动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建设稳产高产基本农田，推动农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

一国政府如果只注重发展工业而忽视农业，那将是决策上的失误和战略上的失败。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国家，如果只注重发展工业，会遇到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农业发展的滞后，会使生产出来的工业品缺乏足够的需求，由此会制约农业经济的增长；二是农业发展的滞后，会使轻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缺乏足够的供给来源，由此会导致总需求与总供给的不平衡，进而产生经济发展的非良性循环。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如果忽视农业的基础作用，如果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推动工业化，如果不能保持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在动态上的平衡，必然会使中国的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都陷入困境。所以，国家必须重点支持粮食生产。一方面加快取消农业税的进程，另一方面是对粮食生产给予直接的财政补贴。同时，政府应继续实行扩大内需的政策拉动农业经济增长。扩大内需会使消费需求总量增长、消费结构变化和消费质量提升。扩大内需的政策效应，一方面会促进农业种植结构发生变化，形成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协调发展的格局；另一方面会促进农业种植技术的变化，形成科学种田、培育与发展优良品种、机械化耕作和集约化经营的格局；再一方面会促进农产品结构发生变化，更多地提供农业加工品，提高了农业初级产品的附加值，使农业的整体效益提高。

### **3 . 政府支持农业信贷**

发展农业鼓励粮食生产，最直接、最有效的政策是国家财政提供直接的财力支持。从目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特征来看，财政政策支持是“一花独秀”的重要支点，已成为缓解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缓慢的必要条件。但完全依赖财政政策支持，会面临两个困境：一是将财政拖入负债过重的境地，对长期财政收支平衡带来不利影响；二是财政的果断投入，会对民间投资和市场化力量产出“挤出”效应。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选择是财政金融政策互动，在政府提供财政支持的同时，应加强金融对农业的服务与支持。

改善农业金融服务的措施之一，是建立以中央和省级政府为主体的信用担保体系，遵循有偿原则提供农业贷款信用担保，根据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承担以信用方式担保所发生的贷款风险。国家信用担保应主要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农业支柱产业和大型农业开发项目的融资提供服务。

改善农业金融服务的措施之二，是建立服务于农民的小额贷款制度，可以直接为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金融服务与支持。农民贷款具有期限短、规模小、贷款主体分散等特点，建立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制度，是适应农民、农村的最有效形式。同时，通过建立“农户联保”的贷款制度，可为金融机构减少农业贷款风险提供制度保障。

#### **参考文献：**

1.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农业综合开发的思路与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
2.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农业综合开发制度汇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3. 韩连贵：《加强农业产业化建设，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25期。
4. 陶传友：《以农业综合开发促进土地资源转变为土地资本》，《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25期。
5. 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经济日报，2004年3月6日。

# 发展研究参考 近期目录

- 第29期：周天勇 财政体制衍生和面临的严峻问题（2005年5月10日）  
安福仁 中国宏观税负水平透视与政策调整取向（2005年5月10日）
- 第30期：艾洪德 振兴东北的金融支持战略：以辽宁为例（2005年5月22日）
- 第31期：李 晶 我国资源税费改革之路（2005年6月6日）  
陈梦根 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外部约束及其化解（2005年6月6日）
- 第32期：课题组 全面推进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保障机制改革的意义（2005年6月14日）  
课题组 国际比较：韩国义务教育普及与保障过程（2005年6月14日）
- 第33期：夏春玉 辽宁农产品的流通模式与市场体系建设（2005年6月30日）
- 第34期：何 帆 郑联盛 中央银行体制框架的柔性要求（2005年7月28日）  
高学武 中美欧纺织品贸易摩擦观察（2005年7月28日）
- 第35期：梁 敏 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战略思考（2005年9月12日）  
曹建海 我国土地节约和集约利用的基本思路（2005年9月12日）
- 第36期：艾洪德 张 羽 解决国家助学贷款供求两难的经济逻辑（2005年9月26日）  
丁 宁 中国新增不良贷款的特点、成因及对策（2005年9月26日）
- 第37期：宋 晶 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基于劳动力市场管制视角的分析（2005年10月15日）  
彭 健 我国政府预算制度的改革取向（2005年10月15日）
- 第38期：李秉祥 周 明 大连科技孵化金融支持体系的构建（2005年11月4日）  
王晓玲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经济学的诠释与促进（2005年11月4日）
- 第39期：郭连成 米 军 中俄转轨时期金融制度安排及其效应分析（2005年11月17日）  
安福仁 中国农业产业化的途径探讨（2005年11月17日）

